

京津沪金融城之变局：历史与域外的双重映象

◎本报记者 郑晓冬 摄

古人云：器大者声必闻，志高者意必远。在纷纷把纽约和伦敦作为标杆之后，为了各自的世界金融中心梦想，一个庞大的金融城建运动正在上海、北京和天津三地同时启动。从上海的陆家嘴东扩到北京的金贸街西进再到天津完善解放北路的，广厦轩宇正竞相负势而起，交通基建正盘桓而生。

同时，为促进金融业发展而制定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人才引进、住房保障等政策正摆放在各地主管部门的办公桌上，或已经出台；相关的金融市场发展计划和机构引进协议也正在国内的修订当中。

由是，在国内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金融全球一体化的双重背景下，受历史积淀与国际标榜的双重激励并围绕自身的战略定位，中国当下最具备区域国际化条件的三个特大城市，正竞相加快自身定义的金贸街中心建设，而以金融城打造为象征，国内金融权力版图正演化产生新一轮的变局。

金融城·城市记忆与国际标榜

5月6日，北京市政府正式宣布将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并透露为此将打造“一主一副三新四后台”的金融功能区新格局。时值上海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举办第四届论坛召开前夕。

作为上述规划的核心部分，北京拟将金融街打造成为主中心区，进一步聚集国家级金融机构总部。为此，北京此前已决定将其西进，把面积扩充到接近3平方公里；北京朝阳CBD则作为金融副中心区，继续凝聚国际金融机构。

与之相比，上海的规划则更为庞大。作为国家钦定的“国际金融中心”，时尚之都已经决定把陆家嘴东扩，届时，将形成“一道三区”（世纪大道、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竹园商贸区、花木生态文化区）的发展布局，规划总面积将达到28平方公里。

纵观上述规划，从中间均能发现英国伦敦金融城的影子，有向国际标榜看齐的意义。在评价上述的规划布局时，欧金伦敦投资有限公司特约经济学家李俊展指出，上述布

局与伦敦金融城布局接近。而对于北京的金贸街西扩，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曙光认为，这是参考英国伦敦金融城的当代发展而作出的未雨绸缪之举，后者由于受原金融城规划的限制，以至近年来出现办公面积狭窄、交通拥挤的情况，与之一条轻轨相连的伦敦东区的金丝雀码头正发展成另一个金融机构汇集地，其西部的梅菲尔和圣詹姆斯则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对冲基金公司。

同时，为促进金融业发展而制定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人才引进、住房保障等政策正摆放在各地主管部门的办公桌上，或已经出台；相关的金融市场发展计划和机构引进协议也正在国内的修订当中。

全球化、区域化和金融支点

尽管如此，庞大的金融城造城运动只是一个城市愿景的面相之一。辐射国内区域经济，进而成为具备国际影响力的区域性核心大都市，才是这些城市最为恢弘的目标，金融只是实现上述目标的道路之一。当然也许是最重要的道路。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金融的积累和支持。当地的金融总量、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往往决定了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速度、规模和水平。因此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第三极的环渤海要发展，就必须在北方建立一个金融中心。”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邓向荣解释说。

事实上，这正是当前国内各地争建金融中心的根本原因之一。在观历了中国率先崛起的珠三角、长三角的经验之后，以及参考国际案例，金融业的发达正成为当前中国各地主要官员心中的一个阿基米德支点，而这又正切合了中国新一轮的区域经济发展大计。

从环渤海到京津冀，从东北振兴到中部崛起，从西部开发到中亚合作，从北到南再到泛北到南，每一个区域的繁荣都迫切需要金融业的支持。在此背景下，在地域面积等调整致衡的中国大地上，出现多个金融中心并不为奇的政策正在形成共识。

而在此间，经由各地经济发展所支撑的中国经济总体复兴，亦正呼唤一个与之地位相应的国际性金

融中心的出现。而这一切，也正与中国推进的金融业纵深改革和全球金融中心化的条件息息相关，与中国正在谋求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重新定位紧密勾连。

定位与筹码

吴念鲁援引国外案例指出，一国之内可以并存多个金融中心，如德国的法兰克福、汉堡和慕尼黑；日本的大板、横滨、东京等等。但以纽约和伦敦等顶级的全球性金融中心为例，国际金融中心一般只有一个，他建议从历史和现实出发，国家应支持上海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国际声望，会为一个城市的金融业的复兴添助力。

经过上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作为国家战略实施以来，加上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上海众多的海内外金融机构云集，已成为当代区域乃至全国金融中心奠定了基础。其不仅产业群全面，而且国际化程度高。

此外，上海还有国家战略规划方面的扶持。其被钦定为中国将来的“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与之相比，北京定位则是“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和宜居城市”；天津则定位于北方经济和航运中心，都并无国际金融中心的要求。

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潘奕衡看来，三大城市在一定的金融领域各自具有部分的国内金融中心性质。上海以齐全的金融市场体系尤其是股票主板市场为主要特色，北京以金融决策和银行中心为主要特色，天津则可能在

内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形成各自的特色。但综合各种情况，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条件更为成熟。

而在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建文看来，金融是一个“市场+机构”的组合，机构跟着市场走，市场的辐射面则能够超出区域范围扩散到全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上海因为拥有比较发达的金融市场，因此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更加明显。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北京和天津不可能在区域性金融建设的过程中把握机会。吴念鲁指出，北京不仅金融总量大，而且汇聚了金融监管机构和各大型金融机构总部，具有金融决策的信息优势和总部经济优

势；天津被定位于北方经济中心，其金融方面允许先行先试，两者可以合建北方金融中心。

政策与变局

事实上，三个城市显然已经注意到了自身的优势与短板，并采取对策应对。在北京的最新规划中，北京提出筹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支持建立全国性的场外交易市场，完善产权交易市场功能，促进商品交易中心在北京发展，推动股权投资市场发展。大力发展金融市场正成为最鲜明的努力。

天津则正着力发展各种类型的产业投资基金，发展私募股权投资，

打造门类最齐全、链条最长的一个全球基金基地，并力争建全国统一的柜台交易市场，探索综合经营和离岸业务中心。

上海则在既有的优惠政策上，考虑制定和实施新的金融发展战略，包括研究并推动金融创新试点，以及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合作和交流、营造金融文化氛围，进一步力图提升金融业发展的软环境。

尽管业界普遍认为，由于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和成熟的商业和文化环境，上海更有利于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但在高须国家政策的一定扶持发展，以及其他城市竞争的格局下，中国金融版图的未来走向仍然充满变数。



【陆家嘴，新起点】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在外滩这个不足1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簇拥着100多幢银行大楼，它被誉为东方的华尔街。600家中外各种金融机构、4000余家中外商会，使当时上海金融市场的规模仅次于伦敦、纽约，成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

靠着同一条黄浦江，但隔着不同的时空，本世纪的陆家嘴正踌躇满志地成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首选。目前，上海较为齐全地集中了证券、期货、外汇、债券、黄金等金融要素。

从宏观层面看，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务院批准了上海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从中观层面看，浦东新区也于去年底出台《上海浦东国际金融中心功能区发展“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陆家嘴金融城”概念。

但可以预见的是，上海走向国际金融中心的道路也充满着来自其他城市的挑战。在国内，香港、北京、深圳、天津等地都在暗自较劲；在国外，纽约、伦敦、东京等领跑较远。

上海在国内城市的竞争中突出重围的同时，如何在国际潮流的变化中紧跟领跑者的脚步，这给我们留下了疑惑。而今明天举行的陆家嘴论坛，恰恰提供了这么一个思考与交流的平台。

本报为您呈现上海成为我国金融中心的独特优势，也坦言上海所面临的挑战。

我们希望，不久的将来，在纽约华尔街、伦敦金融城等一系列名字后面，有上海“陆家嘴”的一席之地。



没有硝烟的战争

香港与新加坡上演金融“双城记”

◎本报记者 郑晓冬

新加坡政府不久前宣布，计划在未來15年内，把目前的金融区扩大一倍，同时增加甲级写字楼的供应，吸引外商和本地企业。

此举被市场广泛解读为新加坡政府力图巩固自身国际金融中心，甩开区内最大竞争者——香港的一个举措。

这两个城市多年来一直把发展金融产业，放在了首要位置，两者在金融产业方面的建树也可谓可观。

新加坡有着发达的期货市场，包括咖啡、橡胶期货、原油和燃油现货市场，在新加坡交易的日经指数和台湾股指期货有相当的活跃度，新加坡还有日本的利率期货交易，有欧洲美元和欧洲日元交易。

香港虽然在商品期货上略逊一截，但是香港的证券市场庞大，筹资能力强，已经成为全球筹资能力最强的证券市场之一。截至今年4月底，香港证券市场的市值达到18.8万亿港元，相当于2.5万亿美元，而同期新加坡股市的总市值为6890亿港元，相当于4921亿美元。

两个交易所的竞争

为了争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新加坡和香港在各方面都卯足了劲，最明显的就是新加坡交易所和香港交易所之间的明争暗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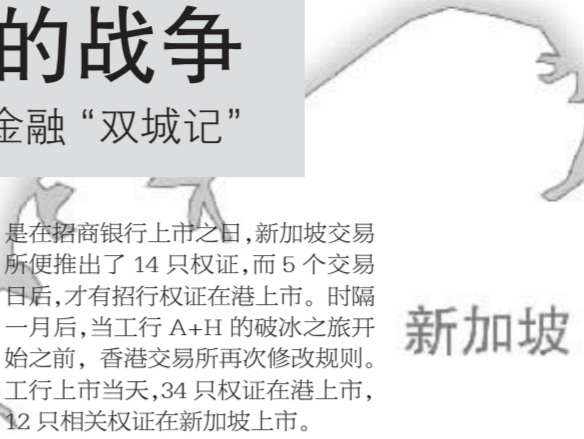
新加坡交易所是亚太地区最早上市的交易所。按照新加坡政府的设想，借助其良好的地理优势，新加坡交易所可以吸引诸多东南亚企业上市，成为仅次于东京交易所并驾齐驱的一个区域性的交易所。新加坡交易所的发展必须依赖海外市场，吸引海外企业上市，尤其是中国内地企业到新加坡上市成为其工作的重中之重。

今年4月，新加坡交易所还开办了其唯一的海外代表处——北京代表处。新加坡交易所的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3月31日，共有141家中国内地企业在新加坡上市，总市值为451亿新加坡元。但上市企业的数量和集资规模，都无法和香港相提并论。

去年共有55家内地企业赴港上市，首次发行新股的筹资额达到2474亿港元。正因为有内地企业的支持，香港交易所已经成为全球筹资能力最强的证券市场之一。

在争夺上市资源方面处于下风的新加坡交易所，却凭借其制度的灵活性，推出了诸多有中国概念的股票权证，来吸引投资者。2006年，新加坡交易所率先推出了深100EFT权证，并在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中海油等多只大型国企上市首日抢发权证。去年10月，新加坡交易所还推出了首个中国股份指数——建方中国指数，希望反映在新加坡上市的中国公司的股价指数。此举被批评为是与恒生国企指数相抗衡的一个产品。

面对新加坡交易所的围追堵截，香港交易所也被迫几次修改相关的上市规定，在2006年9月招商银行H股上市之前，香港修订了其上市条例，缩短了大型新股至少要20个交易日后才能申请发行权证的限制，但



修订法律增强吸引力

为吸引更多金融企业落户本地，加快发展金融服务业，两地也不断修改相关法律，竞相为各基金公司、金融机构送上优惠大餐。

香港在2006年通过了立法会议案，对离岸基金实体豁免所得税。时任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的马时亨说，其他主要国际金融中心，例如纽约及伦敦，均豁免向离岸基金例的地位进一步被削弱。

香港特区政府对基金公司的新优惠包括，对证监会认可的离岸基金公司(海外投资者持有基金超过一定额度，母公司受到海外监管)可以享受税收减免，其他基金公司则要根据运营模式给予一定程度的优惠，而基金持有人享受免税的优惠。

在新加坡，监管机构认可的单位信托基金(UnitTrust)需要缴纳少量特定的收入税。国外投资者几乎不用缴税，新加坡的个人投资者如果投资的是房地产基金或单位信托基金无须缴税，机构投资者则没有优惠。对离岸基金而言，享受免税优惠。

专家认为，打造一个金融中心，凭借一个证券交易所，或者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吸引金融机构入驻肯定是不够的。考量的因素肯定更在于其对资金的吸纳和聚集能力，以及金融监管和金融风险控制能力。

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首先是一个资金的集散中心。要测定资金集散功能的强弱，最好是能够分出中心的资金有多少是用于本地，多少是用于外地。但是，这种综合数据是难以获取的。因此，如能用一个直观而粗略的指标即筹资规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来反映资金集散功能的强弱，那么香港优势明显。按2006年底的数据，香港股票市场的市值是GDP的10倍，新加坡股票市场的市值是新加坡GDP的5倍。国际性的资金集散地，另一个指标，是资金来源的国际化与资金应用的国际化，这一点上香港优势明显。

但是，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与发展研究院(IMD)所发表的权威数据——2007年度年度世界竞争力报告中用以考核竞争力的四大项目之中，新加坡所得到的评价都很高，排名不是持平就是上升，其中政府效率仍是世界第一，基础设施排第三，产业效率和经济表现则名列第四。在该研究院的《2007年世界竞争力年鉴》中，对新加坡的评分已从去年底的90.993分提高至99.121分，香港则从96.866分提高至93.541分。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两个城市的竞争还将继续，并且更趋白热化。

新加坡

纽约

伦敦

深陷次贷危机 两大金融中心雄风渐失

◎本报记者 朱周良

去年以来集中爆发的次贷危机，让美国最引以为豪的金融中心，占全球金融损失的四成。

在损失的排行上，花旗、美林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英国和英国的老牌金融巨头名列前茅。次贷带来的巨大损失也迫使花旗、摩根士丹利和瑞银等纷纷向以主权基金为首的外部投资人伸出援救之手。

金融就业人数骤降

次贷危机给西方金融业带来的另一冲击便是裁员。彭博社的统计显示，过去十个月以来，全球大型投行、券商的裁员人数已接近65000人。瑞银本周二宣布裁员5500人。摩根士丹利周二也宣布裁员1500人。苏格兰皇家银行上周则表示，将裁员7000人。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该国金融业目前的就业人数已比去年同期减少了6万人。其中，美林公司裁员4000人，雷曼兄弟裁员1425人，而被并购的大道收购的贝尔斯登则预计有14000名员工将被迫离职。

纽约大学的经济学家菲利浦·迪瓦特表示，美国金融业自2002年开始面临的失业潮未来正在趋于破灭。据他的预测，美国金融保险业失业人数将达到630万人左右，才符合历史正常水平，也就是说，金融业还有70万人可能面临丢掉饭碗。

IPO融资活动降温

对于纽约和伦敦这些顶尖的国际金融中心来说，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在于其作为国际中

介平台的地位和吸引力。多年以来，纽约一直是包括中国公司在内的国际企业首选的海外投融资平台，而近年来随着伦敦金融城和泛欧交易所的快速发展，伦敦和巴黎等欧洲城市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外上市资源。

然而，在次贷危机爆发后，随着市场波动加剧，投资人规避风险意识增强，大量融资活动不得不搁置，即便是纽约和伦敦这样的金融中心也难以幸免。

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放弃IPO计划的公司数量达到自网络泡沫破灭以来的最高水平。共有90家公司在今年第一季度放弃或推迟了IPO，高于去年第四季度78家。上一次出现如此多的IPO搁置还是在2001年第一季度，当时被搁置的上市交易达到93笔。

《华尔街日报》日前以“美国金融业是否已过了鼎盛时期？”刊文指出，在次贷危机的冲击之下，以往在美国股市、企业盈利以及整体中占据绝对多数权重的金融业，正在失去往日的光环。文章指出，金融业在美国经济活动中的角色正在淡化，由此可能给整体经济带来巨大影响。

新泽西的一位美国基金经理预言，在未来几年，美国金融业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将会明显下降。而研究机构ISI集团的分析师加拉格列认为，美国的金融业已到了一个“转折点”，不管是金融业占股市还是占GDP的比重，都已见顶。

其次，证券市场。资金筹集和配置的核心平台就是证券市场，而证券交易所则是证券市场的核心。据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金融统计，截至2006年，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市值占全球市值为15.4万亿美元。而由于股权分置改革取得重大突破，2006年上海证券市场市值同比增长220.0%，这一增长速度是全球最快的。

首先，外汇市场。外汇市场的成空，一直被认作是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评估标准，它反映了一个金融中心是否容许自由兑换和资金自由流动。根据BIS在2004年关于外汇和外汇衍生品市场的调查，最活跃的外汇交易中心非美国莫属，占全球成交量的31%，其次则是英国、日本、新加坡等。

而在本轮危机之前，伦敦就已经显露出在国际金融中心竞争方面的优势。以伦敦金融城为中心的伦敦金融服务业，占到了英国GDP的10%左右，是英国的支柱产业。在最近几年的多项排名中，伦敦都超过了纽约，排在全球金融中心竞争力的首位。

正当英国人准备开启香槟庆祝之时，次贷危机不期而至。面临金融海啸巨亏，信贷市场流动性枯竭以及股市剧烈波动，伦敦也不得不放慢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步伐，并将主要精力放在应对危机之上。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从以往经验来看，当前这场被一些人认为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很可能加速国际金融中心格局的演变，新的国际金融中心将由此形成。他认为，次贷危机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的旧国际金融格局的危机，同时也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参与构建国际金融中心格局的良机。

《华尔街日报》日前以“美国金融业是否已过了鼎盛时期？”刊文指出，在次贷危机的冲击之下，以往在美国股市、企业盈利以及整体中占据绝对多数权重的金融业，正在失去往日的光环。文章指出，金融业在美国经济活动中的角色正在淡化，由此可能给整体经济带来巨大影响。

新泽西的一位美国基金经理预言，在未来几年，美国金融业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将会明显下降。而研究机构ISI集团的分析师加拉格列认为，美国的金融业已到了一个“转折点”，不管是金融业占股市还是占GDP的比重，都已见顶。

其次，证券市场。资金筹集和配置的核心平台就是证券市场，而证券交易所则是证券市场的核心。据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金融统计，截至2006年，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市值占全球市值为15.4万亿美元。而由于股权分置改革取得重大突破，2006年上海证券市场市值同比增长220.0%，这一增长速度是全球最快的。

首先，外汇市场。外汇市场的成空，一直被认作是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评估标准，它反映了一个金融中心是否容许自由兑换和资金自由流动。根据BIS在2004年关于外汇和外汇衍生品市场的调查，最活跃的外汇交易中心非美国莫属，占全球成交量的31%，其次则是英国、日本、新加坡等。



国际金融中心“权力排行榜”

◎本报记者 石贝贝

“有哪些金融服务需求，金融需求的程度有多少，还有法治、监管、信息透明度等因素，将一起成为判定金融中心的先决条件。”在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的眼里，建造国际金融中心中的首要条件就是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只有看清世界上不同特点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兴起过程，我们才能真正看清中国建设金融中心有着更为清晰的思路：想清楚中国建设中的国际金融中心拥有哪些特点，能提供哪些特色金融服务。

翻开金融中心的一些发展史，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繁荣景

向香港靠拢 深圳力图摆脱区域限制

◎本报记者 周鹏峰

毗邻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深圳力图融入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万义。深港携手，正倾力在我国金融版图甚至世界金融版图上添上强劲一笔。

这一切，都在有条不紊进行着。广东省“十一五”规划提出，要推进广州、深圳区域金融中心建设。深圳经济特区金融发展促进条例(草案)则明确提出深圳“成为深港大都会及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构想。

摆脱区域限制，在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今日深圳金融业的长远发展构想。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向香港靠拢成为深圳的必然选择。

而香港，当然深切感受到了那种喷薄的热情，适时伸出了深化深港金融产业合作的“橄榄枝”。或如专家所言，深港优势互补，对于两地金融业而言都将是极大的推动力，构建或巩固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区域的长远规划第一次变得如此清晰。

互补多于竞争

改革开放三十年，深圳已基本形成了以深交所为依托，以向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为主的资本市场，而香港则是业已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金融系系主任陆军教授看来，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与深圳的互补性很强。汇丰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也认为，香港、深圳互补多于竞争，如能协调好，可在一系列领域展开合作。

屈宏斌认为，香港完全可以充分利用深圳以及广州等珠三角城市

土地和人员等各种成本较低的优势，大幅降低经营成本，提升竞争力，进一步巩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陆军也表示，两地地缘以及人文、语言互通优势，合作有很大便利性。

事实上，粤港尤其深港两地金融合作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且由来已久。早在1982年，香港南洋商业银行率先在深圳设行，拉开了深港两地金融合作的序幕。来自深圳银监局的资料则显示，截至2007年9月末，包括汇丰、东亚、恒生等在内的港资银行在深圳设立的机构共34家，是国内港资金融机构最多的城市。

显然，港资银行在深圳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经营理念和创新服务，这对提高深圳银行业竞争力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有助于深圳银行业向国际惯例看齐。

正如陆军所言，粤港两地金融产业合作的逐步推进，进一步巩固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是珠三角各中心城市金融业进一步的重要原由。

谋建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

2007年底，深圳市四届人大常委会议首次审议了深圳经济特区金融发展促进条例(草案)，该草案明确提出要把深圳建设成为“我国中小企业与创新型企业融资中心、基金与财富管理中心、金融创新与服务中心、金融人才集聚中心、金融中心”，并使深圳“成为深港大都会及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是深圳首次明确欲与香港合作共建世界级金融中心。无疑，深港两地加强合作，对于推进两地发展、以及构建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意义非凡。

可以说，深港各有优势，对于港资金融机构而言，深圳政策环境和市场氛围相比其他内地城市更具吸引力。与此同时，作为香港腹地，陆军认为，珠三角经济迅猛的发展对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尤为关键。某种程度上讲，珠三角经济的发展是香港持续发展的一大推动力。

于香港而言，深圳犹如一座桥梁，是其分享深圳乃至内地经济高速发展的最佳通道。这也是港资银行扎堆深圳拓展内地业务的主要原因。

深圳

香港

